

社会流动视角下女性体育参与研究

朱冀¹, 景怀国²

(1.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体育与健康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2.广东工业大学 体育部,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社会流动视角下, 依据王小波女性群体的5大阶层划分, 利用定额抽样法, 于广州、开封两地各选取5大阶层覆盖24种职业和类型的24名案主, 在社会流动的一般概况、代内流动与体育参与、代际传递与体育参与3个维度进行结构型访问的个案研究, 探讨女性体育参与情况。研究认为女性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向上流动(阶层地位变化)的主要动力。当社会流动改变了其原有社会阶层地位时, 她们的体育参与(时间、场所、伙伴等)会发生一定变化, 但体育价值观(价值取向)和喜欢的体育项目基本不变。体育所具有的学习性、模仿性和传播性, 使其具备传递功能。女性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受到父母的影响, 表明体育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 并且这种传递性特征不存在阶层间的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社会流动; 代际传递; 女性体育参与;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2)04-0074-06

A study on female sports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low

ZHU Ji¹, JING Huaiguo²

(1.Institute of Sports and Health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Given few research on women's sports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bility has not made, the present paper refers to Wang Xiaobo's five layers-classification of female groups and selects 24 persons from five layers in 24 professions in the cities of Guangzhou and Kaifeng by quota sampling method, and makes a case study of structured interview from three dimensions, so as to discuss the condition of female sports particip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ive efforts of women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upward flow (change of class status). When the social flow changes their original social status, their sports participation (time, place, partners) will change to some extent, but their sports valu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eference are basically kept unchanged. The three properties of learning, imi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ke it have the transmission functi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the sports that women like and participate in persistently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port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es in the aspect.

Keywords: sports sociology; social mo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female sports participation; case study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开辟了女性体育参与的实践。但基于实践进行的研究永无止境, 时至今日, 仍然可以看到社会流动视角下体育、特别是女性体育研究的缺失。比如, 家庭体育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健身、娱乐、融洽家庭氛围、凝聚亲人关系等, 还在于父母向下一代

子女传递体育的知识和技能, 而这恰恰为目前的研究所忽略。又比如, 就读体育专业院校的女性, 是希望借助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 但却鲜见她们毕业后流向哪里, 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流动到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以“女性社会流动与体育参与”为题在中国知网检索, 只检索到署名张三梅^[1]的文章;

收稿日期: 2021-10-26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20XTY16)。

作者简介: 朱冀(1980-),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E-mail: zhuji@henu.edu.cn

再在国家社科规划办官网检索,也只检索到1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的立项(09CTY008 李留东“我国优秀运动员家庭社会阶层背景及其社会流动”)。

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阶层)向另一个地位(阶层)的位移现象^{[2]323}。社会流动有水平流动(在某阶层内部流动)、垂直流动(在各阶层之间向上或向下流动)、代内流动(同代流动)和代际流动(异代流动)等。社会学界所倡导的合理的社会流动,一是指量的合理性(在社会分工需要和社会承受力允许范围内的流动量);二是指质的合理性(体现机会公平的原则,打破阶层固化,畅通社会流动,使中下层和底层看到希望)。从社会良性运行协调机制的角度看社会流动,其意义在于:有利于整个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式的社会分层结构;有利于创造社会成员改变自身社会阶层地位的机会;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特别是普遍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公平发展^{[2]327-333}。从以上社会流动的定义中不难看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进而也可以说,研究社会流动需要以社会阶层为参照。于是,二者共同构成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女主内”的中国传统女性角色观念正在经历现代转型,大批城市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大批农村女性汇入“民工潮”,使她们成为社会流动重要群体。从社会流动视角研究女性的体育参与,不仅可以通过自身角色变迁和职业地位的变化,观察其体育参与的变化情况,还可以考察不同阶层女性的体育参与是否受到上一代人的影响,以及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从社会流动视角研究女性的体育参与,有利于改变体育学术界传统的以男性为参照的女性体育参与研究(性别比较),有利于明晰女性体育参与的内部差异,有利于为促进体育社会学研究和女性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过程

1.1 关于女性群体的社会分层

针对目前社会学界的“十大阶层”划分,有学者指出,将女性群体的社会分层涵盖于社会整体的分层之中,容易忽视女性分层的一些特点。为此,王小波^{[3]46-51}在其“女性分层:以阶层观察性别”中将女性群体划分为5个层次。以王小波女性群体的5阶层划分为基本依据,对各阶层所涵盖的职业和类型稍加补充,将其作为本研究参照的女性群体社会分层。

1.2 个案研究法的应用

1)确定研究单位。

“个案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一个社会或社会生活的任一其他单位”^{[4]220}。任何个案都存在于特定地理空间内,因此,选择个案首先需要确定个案存在的地理空间位置,即本研究以广州和开封作为研究单位。广州(一线城市),简称“穗”,别称羊城,副省级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国际化大都市^[5]。开封(四线城市),简称“汴”,古称汴州、汴京,河南省地级市、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城市^[6]。这两座城市虽然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医疗、交通、基础设施、人口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但改革开放后广州和开封两地(以下简称“两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长足进步,都造就众多女性企业家、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白领、粉领、打工妹,乃至职业太太等,使两地间有共同的具体研究对象。本研究试图在对研究主题总体描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两地间社会流动视角下女性体育参与的异同,透视其背后的地区差异。

2)选取案主(被调查对象)。

个案非统计样本,不能以个案推论总体。因此,可以不要求个案的代表性。这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的基本共识。但对于个案是否应该具备典型性尚有分歧,比如,范伟达^{[4]22}在《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出:“个案调查不要求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而王宁教授则强调个案的典型性。王宁认为,既然个案研究不能要求以其代表性推论总体,那么如何把个案研究的结论扩大化呢?这就是分析性推理。所谓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就是直接从个案上升到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形式,其外推范围越大,它的价值就越大。而提高个案研究结论可外推性重要解决办法,就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所谓典型性即是某一类共性的集中体现^[7]。因此,我们对两地案主的选取采用“检验理论、解释关系或比较不同性质群体”的定额抽样法。此方法不需要严格随机抽样,而是根据研究目标,寻找适合于解释关系、检验理论等的符合条件的样本^{[8]143},使之能够涵盖女性群体的5大阶层,从而具备典型意义。其次,由于同一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职业和类型(比如,下层中的无业、失业等,就是该阶层中非职业隶属的类型),所以,为使每个阶层的案主选取大体上能够覆盖该阶层的职业和类型,使之更具典型意义,本研究对两地案主分别选取5大阶层所涵盖的24种职业和类型(见第76页表1)。

3)应用访问调查。

(1)结构型访问调查表的编制。遵照社会学有关要

求, 编制结构型访问调查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流动的一般概况、代内流动与体育参与、代际传递与体育参与。

(2)结构型访问调查表的效度检验。在编制结构型访问调查表的过程中, 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几经修改。定稿后, 又聘请具有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 4 位教授及 3 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体育学教授, 征询其对调查表设计的意见和进行主题的有效性判定, 得到专家一致认可, 并根据专家宝贵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调查表。

(3)结构型访问调查表的信度检验。为保证结构型访问调查表可靠性, 在进行效度检验后, 又利用重测(再测)法, 先后两次(两次之间间隔为 10 天)向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部的 20 名女性教职员工发放该调查表。回收后经统计(将两次填答答案赋值得分, 并分别累加),

形成了两组数据, 代入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公式计算, $R=0.83$, 表明该调查表具有较高可靠性。

(4)调查实施。2021 年 7-8 月, 广州、开封两地访问调查同步实施, 共分 3 个阶段: 第 1 阶段, 依据研究设计的规定, 选取涵盖女性群体 5 大阶层 24 个职业和类型的案主。第 2 阶段, 考虑到上层与中上层(两地各 9 人)的被选案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且工作繁忙, 经与案主协商, 利用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 通过微信、QQ、邮件等方式, 将调查表链接发给案主, 填写完成后, 在平台下载(回收)访问调查表。第 3 阶段, 对于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两地各 15 人)的被选案主, 分别约定时间、地点, 一律采用面访调查(面访中强调不记姓名、单位, 每位面访时间约 15~20 分钟)。调查表全部回收后, 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PSS17.0(中文版)进行统计处理。

表 1 广州、开封案主选取的职业和类型及其数量¹⁾

阶层等级	人数	阶层所包括的职业类型或状况
上层	4	科级(含)及以上级别干部, 副高(含)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家, 中外大型企业中层(含)及以上的管理者
中上层	5	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工程师或会计师或主治医师, 媒体记者或编辑, 公司白领, 私营企业主
中层	6	中学或小学教师, 高校教辅人员, 护士, 秘书, 个体户, “职业太太”
中下层	5	工人(含农民工), 农民, 保安, 卫生员工, 物业员工
下层	4	无业, 失业, 下岗后未再就业, 打短(零)工

1)本表各阶层等级所包括的职业类型或状况, 是在《王小波女性群体社会分层》基础上稍加扩展形成的; 广州 24 人, 开封 24 人, 案主年龄都在 55 岁以下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社会流动的一般概况

1)年龄与地理空间流动。

在 48 个被调查案主中, 年龄最小的 27 岁, 最大的 53 岁, 平均年龄为 40.8 岁(经独立样本 T 检验, 两地案主年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认为, 她们中的多数人是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 其成长和工作阶段, 正值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驱动下的社会结构分化和流动浪潮。社会学一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迁徙)也归于社会流动的范畴。所以, 77.08%(37 人)的被调查案主都经历过 2 次或 2 次以上地理空间流动的状况(其中, 上层、中上层和中层有 27 人, 占该 3 个阶层总人数的 90%), 与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结构分化和流动浪潮的现实基本吻合。

2)学历与社会阶层分布。

48 个被调查案主的学历分布为: 小学 2 人、初中 11 人、高中 6 人、大专 4 人、本科 11 人、硕士 13 人、博士 1 人(经独立样本 T 检验, 两地案主学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在具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 25 人中, 上

层有 7 人(占该层的 87.5%)、中上层 10 人(占该层的 100%)、中层 8 人(占该层的 66.7%), 表明文化资源在阶层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当然, 不可否认低学历的也有成功者, 但那是小概率事件; 高学历的也有失败者, 同样是小概率事件, 因此不宜以此推论总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截至 2019 年, 我国本科毕业生数量占总人口的 3.8%, 并非像网上曾流传的那样“大专多如狗, 本科遍地走”。现在, 本科学历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用人单位的基本门槛条件, 不具备本科学历, 连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都没有, 谈何成功。

3)代际流动的比较。

在以父亲为参照点的代际流动比较中, 有 54.2%(26 人)的案主高于同年龄段父亲的阶层地位, 其中广州高于开封 8.33%; 有 35.4%(17 人)的案主低于同年龄段父亲的阶层地位, 其中开封高于广州 10.42%, 显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还有 10.4%(5 人)的案主与同年龄段父亲的阶层地位一样。社会学家李培林认为, 社会流动有复制式与替代式之分, 我国民间有一种“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说法, 描述的就

是子承父业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如“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垄二代”等)。而替代式社会流动,即指子代没有承继父业(向上或者向下流动了)。比如,中国历史上“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指的就是替代式社会流动⁹⁾。所谓贫富两极分化,其实质是阶层地位差距的扩大和“马太效应”的持续。因此,只有替代式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畅通,才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缩小阶层间的差距。

4)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

(1)向上流动。在2009—2020年间,有60.4%(29人,广州14人、开封15人)的案主实现了向上流动,其基本流动趋势是: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在实现向上流动的原因中,选择父母帮助的占5.45%、老同学或好友帮助的占10.91%、领导赏识的占10.91%、亲属帮助的占18.18%,但通过个人努力具备了向上流动的条件而应聘成功的占压倒优势的54.55%(其中,广州占20%,开封占34.55%,也显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比如,本研究8个上层案主的学历分别是:博士1人、硕士3人、本科3人、高中1人,表明文化资源在向上流动中的重要性。在8人中有7人(87.5%)的社会阶层地位高于同龄期父亲,实现了向上流动(替代式社会流动);有1人与同龄期父亲的社会阶层地位一样(上层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在8人中有1人是由下层到上层的(高中学历,在父母和朋友的帮助下,由下层的失业一跃成为广州的企业家,说明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作用,有时甚至会超过文化资源);另有1人是由中层到上层的(硕士学历,通过个人努力跃升为开封的企业家);其余6人是由中上层到上层的。在8人中有7人(87.5%)的向上流动是通过个人努力应聘实现的。

(2)向下流动。在2002—2020年间,有29.2%(14人,广州、开封各7人)案主向下流动,其基本流动趋势是: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比如,2名“职业太太”是由中上层辞职流动到中层。又比如,8个下层案主的学历分别是:小学1人、初中3人、高中2人、本科1人(广州本科毕业后生小孩一直未就业)、硕士1人(广州个体老板破产后未再就业)。在8人中有7人是向下流动到下层的(2人由中层流动到下层,5人由中下层流动到下层),还有1人未流动(广州一直未就业者)。在8人中有6人(75%)的社会阶层地位低于同龄期父亲,有2人与同龄期的父亲一样(下层的复制式社会流动)。14名案主对向下流动原因的选择是:领导不赏识的占4.35%、受到打击排挤的占4.35%、个人努力不够的占8.7%、学历不够的占13.04%、工作岗位被撤销的占13.04%、受到性别歧视占17.39%、

其他原因占39.13%(主要包括照顾家庭的需要、受疫情影响、年龄问题和生病等)。通过比较,广州案主向下流动原因主要集中在学历不够和其他原因两个方面,而开封案主向下流动原因的选择呈多元化。

(3)未流动。在2002—2020年区间内,未流动被调查案主共有5人。其中,在广州3人中,有1人是本科毕业后一直未就业(属于无业人员),有1人是一直未晋升的白领,还有1人是农民;在开封的2人中,有1人是一直未晋升的普通公务员,还有1人是农民。

5)对于向上流动(升迁)是否困难的认知。

女性群体5大阶层被调查案主对于向上流动(升迁)的认知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方差检验 ANOVA 的显著性水平为0.042, $P < 0.05$),即上层、中上层对于向上流动(升迁)的信心和决心明显强于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2.2 代内流动与体育参与

1)体育价值取向。

被调查案主的体育价值取向在5个维度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身心健康”(21人,43.75%)和“身材健美”(13人,27.1%)两个维度。与广州案主倾向于“身心健康”和“身材健美”相比,开封案主更倾向于“体育能给我带来快乐”和“有利于与同事朋友的社交和沟通”,两地案主的体育价值取向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03, $P < 0.01$)。经进一步检验被调查案主现在与阶层地位变化前的体育价值取向,未发现显著性差异(方差检验 ANOVA 的其显著性水平为0.674, $P > 0.05$)。这可以说明体育价值观(取向)一经形成不会轻易改变。

2)参与体育活动的的时间。

达到体育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标准的有19人,占被调查案主39.6%(略高于全国体育人口的比例水平)。其中,开封案主占体育人口总数的68.42%(13人),高出广州(6人)36.84%,这可能与两地案主体育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四线城市竞争的激烈程度、生活节奏和生活压力低于一线城市广州的地区差异不无关系。经对5个维度参与体育活动时间的方差检验,5大阶层参与体育活动的的时间差异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06, $P < 0.01$)。进而,经独立样本 T 检验,两地案主参与体育活动的的时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0.04, $P < 0.05$)。当问及“您参与体育活动的的时间与阶层地位变化前有差异吗”?回答有差异的22人(占被调查案主的45.84%),其中上层和中上层(共7人)与阶层地位变化前参与体育活动时间的差异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参与时间比以前多了;二是参与时间比以前少。由于对上层和中上层采用的是问卷星调查,没有进一步的设问,故推测前者可能是由阶层地位升迁

经济条件好转或工作关系的需要所致,后者则可能是由于阶层地位升迁工作比以前忙所致。

3)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

调查结果显示:在A场所(中大型经营性健身场所)健身的3人(上层2人、中上层1人);在B场所(小区收费健身场所)健身的12人(上层3人、中上层4人、中层5人);在C场所(不收费场所)健身的33人,占68.75%(上层3人、中上层5人、中层7人、中下层10人、下层8人)。这一场所选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被调查案主总体的体育消费水平不高。当问及“您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与阶层地位变化前有差异吗”?回答有差异的13人(占被调查案主的27.08%)。其中,向上流动者(7人)场所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由C至B或由B至A;向下流动者(6人)场所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由A至B或由B至C,但广州的“职业太太”(中层)却是由C至B。

4)参与体育活动的伙伴。

在对A伙伴(单位同事)、B伙伴(朋友)、C伙伴(家人)、D伙伴(亲属)、E(自己一个人)的选择中,B和C两类的选择占压倒优势(79.2%,38人)。当问及“您参与体育活动时的伙伴与阶层地位变化前有差异吗”?回答有差异的占33.4%(16人)。其中,在向上流动的9人中,由B变A的4人(中上层3人、中层1人),由C变A的4人(上层2人、中上层2人),由E变A的1人(中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阶层地位升迁后,人们更注重通过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来增强与单位同事的友谊。

5)参与体育活动的项。

在所列出12类体育活动项目中,被调查案主选择概率排前4位依次是:(1)散步、慢跑;(2)广场舞;(3)瑜伽、健身健美;(4)羽毛球、乒乓球。合计37人,占被调查案主总数77.08%。经检验,在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不存在各阶层间和两地地区间的显著性差异,也不存在阶层地位变化前后显著性差异。由此分析:第一,被调查案主喜欢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基本上不受阶层地位变化的影响。第二,被调查案主喜欢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表现出较明显符合女性身心的特点。第三,从排序前两位的散步、慢跑和广场舞几乎完全不需要金钱支付的情况看,这是被调查案主总体体育消费水平不高的又一表现。

2.3 代际传递与体育参与

代际传递与体育参与的关系,主要是考察不同阶层女性的体育参与是否受到了上一代人的影响,以及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代际传递”是社会学术语,“指父母一代传递给子女的各

种特征,不仅包括身心特征,还包括各种社会特征”^[10]。

1)体育价值取向受父母影响程度。

女性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父亲的影响,但有时更易接受母亲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统计,并不完全以父亲的影响为参照,而是在受父母影响的程度这两个问题中,以就高不就低的方式二选一。结果表明,上层和中上层的体育价值取向受父母影响的程度明显的高于其他3个阶层,而在没有受到父母的影响方面则明显的低于其他3个阶层。经方差检验,体育价值取向受父母影响的程度存在明显阶层差异(显著性水平0.031, $P < 0.05$)。进而,在两地案主体育价值取向受父母影响的程度之间也存在明显地区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显著性水平0.021, $P < 0.05$)。

2)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

对于“如您经常(偶尔不算)喜欢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比如,羽毛球),多年来持之以恒,无论年龄变化和职业地位变动,都未受到影响,那么您所喜欢的这个项目(比如,羽毛球),是否受到父亲或母亲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各有50%的案主(共15人)、中下层有40%的案主(4人)、下层有12.5%的案主(1人),回答说受到父亲或母亲的影响(经方差检验,各阶层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表略)。这些受到父亲或母亲影响的案主在进一步的选项中,多数案主回答说,是因为父亲或母亲喜欢并从事这个项目。此外,也有的回答说是父亲或母亲常常指导我练习这个项目;有的回答说是父亲或母亲常常带我一起参与这个项目;有的回答说是父亲或母亲送我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培训班。当再进一步问到,“您多年来持之以恒喜欢的这个体育活动项目,是否也像当年您的父母支持您那样,支持您的孩子参与这个体育活动项目”?所有人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另外,也有28人(58.33%)回答说“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没有受到父母影响的。究其原因,第一,社会个体体育价值观的形成、运动习惯的养成和运动技能提高所接受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在家庭代际传递的范畴,还要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的影响。所谓没有受到父母的影响,只不过是家庭的影响(代际传递)对其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未能在三维结构的影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第二,在中国历史上,“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根深蒂固,促成了技艺上“传男不传女”的性别偏见,这或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体育运动在家庭中对女性的代际传递。第三,可喜的是,尽管这28人回答说其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没有受到父母的影

响,但却百分之百表示会支持子女参与这个体育项目。这一认识,无疑将有利于其向下一代的体育代际传递。

2.4 职业太太的体育参与

“职业太太”是王小波在女性群体阶层划分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3]46}。在传统观念里,无业在家操持家务的女性一般会被称作“家庭妇女”。如果按照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划分,“家庭妇女”属于无业人员,显然是社会下层(底层)。但按照王小波的观点,就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一些男方赚钱养家绰绰有余的家庭,女性完全不用上班,可专心相夫教子。这些女性在王小波的女性群体阶层划分中被称为“‘职业太太’(中间层),其特点是: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因为家庭条件悠闲富有,为了照顾家庭,解除女性工作、家庭双重负担的矛盾,才选择离职成为‘职业太太’的”^{[3]46-51}。本研究接受了王小波的这一观点,所选取的两位职业太太(广州案主38岁,硕士学位;开封案主32岁,大专学历)具有较多相似之处:2人离职前均属于中上层,辞职向下流动原因是照顾家庭的需要;广州案主的家庭年收入在60万左右,开封案主在40万左右,家庭都比较富裕;2人的体育价值取向都是符合女性身心特征的健身、健美,喜欢并经常和朋友一起参加的体育项目都是瑜伽、健身健美(开封案主还喜欢民族舞)。2人的差异点在于:广州案主从离职前的大约每月1次参加体育活动转变为每月2~3次,开封案主从离职前的每周1~2次参加体育活动转变为体育人口;广州案主从离职前的不收费体育活动场所,转变为离职后的居住小区收费性健身场所,而开封案主则从离职前的中大型健身场所转变为离职后的居住小区收费性健身场所;广州案主多年来持之以恒喜欢的体育项目没有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开封案主却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王小波指出,“职业太太”比上层、中上层的职业女性拥有更多闲暇时间;比中下层、下层的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本研究认为,在未来“职业太太”将与上层、中上层的职业女性一同成为女性体育消费的主力军。

3 结论

女性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向上流动(阶层地位升迁)的主要动力,文化资源是其必备的条件。但在不具备文化资源优势的条件下,有时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占

有优势,也会促进社会个体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女性在通过社会流动改变其原有社会阶层地位时,她们的体育参与(时间、场所、伙伴等)会发生一定变化,但体育价值观(价值取向)和喜欢的体育项目基本不变。女性的体育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阶层差异。体育所具有的学习性、模仿性和可传播性,使其具备了传递功能。女性喜欢并持之以恒参与的体育项目受到父母的影响程度,表明体育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传递性特征不存在阶层间的显著性差异。通过两地案主的比较,在代际流动、向上与向下流动及其原因、体育价值取向、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以及代际传递的影响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作为一个社会截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地间的地区差异。

参考文献:

- [1] 张三梅. 从社会流动视角看中国女性的竞技体育参与[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1(5): 20-23.
- [2] 郑杭生, 李强, 林克雷.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3] 王小波. 女性分层: 以阶层观察性别[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6-51.
- [4] 范伟达.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5] 百度. 广州[EB/OL]. [2021-09-26]. https://www.baidu.com/s?ie=utf-8&wd=广州&tn=56080572_11_hao_pg
- [6] 百度. 开封[EB/OL]. [2021-09-26]. https://www.baidu.com/s?ie=utf-8&wd=开封&tn=56080572_11_hao_pg
- [7] 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个案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 社会学研究, 2002(5): 123-125.
- [8] 风笑天. 社会研究方法[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沙龙, 李培林. 社会流动与中国梦[EB/OL]. (2013-05-03)[2021-10-08]. <https://wenku.baidu.com/view/5954dc62a45177232f60a28e.html>
- [10] 石军. 代际传递: 为分析家庭教育问题,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社会学视角[EB/OL]. [2021-08-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69267463408597&wfr=spider&for=pc>